

柳萌自选集

纪实文学卷

空谷回声

柳萌



作家出版社

柳萌自选集

纪实文学卷

空谷回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谷回声/柳萌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2
(柳萌自选集)

ISBN 978 - 7 - 5063 - 5537 - 7

I. ①空… II. ①柳…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7014 号

空谷回声

作者: 柳 萌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62 千

印张: 28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37 - 7

总定价: 90.00 元 (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柳萌 柳萌，天津市宁河县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工人日报》社、《新观察》杂志社、《中国作家》杂志社、作家出版社、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小说选刊》杂志社供职。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随笔集：《生活，这样告诉我》《心灵的星光》《岁月忧欢》《寻找失落的梦》《消融的雪》《穿裤子的云》《当代散文作家精品文库——柳萌散文》《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珍藏向往》《真情依旧》《生命潮汐》《春天的雨秋天晴》《绿魂》《变换的风景》《无奈的告白》《夜梦与昼思》《悠着活——柳萌散文随笔选》《时间的诉说》《文坛亲历记》《放飞心灵的风筝》《村夫野话录》《这个秋天没有乡愁》等二十余种。



从部队转业前在北京（1954年）

说谎无异于给自己下绊，迟早会摔个嘴啃泥，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

——柳萌



“反胡风运动”后在北京（1955年）

经常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起初我也想这样相信和接受，后来渐渐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生活正常人，为获得这样的「财富」，自己主动地去经历苦难，可见这种本可以避免的苦难，在人们意识里并非是真的好东西。不过，做为一个有过苦难经历的人，我始终是这样认为：假如你真的经历过苦难了，苦难的感受已经溶入你的血脉里，你就必须把它们当做财富，不然，你的种种苦难岂不是白受？！

——柳萌



去北大荒前在北京（1958年）

性格决定命运（代序言）

国际写作营营址，在庐山别墅村。

邓友梅、束沛德二兄和我，是参加写作营作家中，中方作家最年长者。出于对年长者的关照，我们这三位七旬老人，分别居住三处别墅套间。友梅兄住的是一栋新别墅的套间，陈设和生活设施，自然更有现代气息。我和沛德兄住 176 号别墅，两个单独的别墅套间，门对着门，窗邻着窗，如同这栋别墅的两只手臂，直愣愣地从别墅两旁伸出来，不知是欢迎客人的表示，还是拒绝来访者的姿势，大概只有别墅设计者知道，留给后来人的只是猜测和联想。由于建筑年代久远，面积和设施都很一般，不过住着还算舒适。

好像是来到庐山次日，吃早餐的时候，作家郭雪波先生问我：“柳老师，昨天晚上，徐坤我们去你房间，几个人又敲门又喊叫，把瑞典老太太（参加写作营的瑞典作家林西莉女士）都吵火了，你怎么就未听到啊？”我问了问他们来的时间，那时我正在洗澡未能听见，对于这几位年轻文友的造访未遇，我自然表示歉意和遗憾。雪波随后又跟我说：“你知道你那间房，过去谁住过吗？彭德怀。《万言书》就是在那儿写的呀。”噢，真未想到，这 605 号房间，还有这么一段经历。其后包括外国作家在内，许多人都对这间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来参观，有的来拍照，我就成了房间主人，热情地接待来访者。

知道了这是个有故事的房间，这次有幸暂住这里，我的心情和思绪，比之别人更为复杂更为不安。有天夜里似睡非睡，冥冥中听到有声音，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我定了定神坐起来，拉开窗帘往外一看，外边小雨飘飘洒洒，却丝毫没有有什么声响。再仔细地听一听，原来是密集雨滴，敲落在铁皮屋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这声音让我联想起，战场的机枪声，会议的发言声，瘾者的絮叨声，睡眠的梦话声，还有受冤屈人的申诉声。这时再也睡不着觉了。我想到作为一代英雄的彭德怀的人生，我想到作为一

个凡人的自己的人生。最后，我只能说，如何解释我们的人生呢？如果让我概括的话，只有两个字：命运。

我知道我的经历，跟大人物的经历，实在没有可比性。不过无论是谁，命运都是一样。当年彭老总为民上书，被打成小集团的首脑，这是由于偶然事件，给他造成的命运悲剧。当年我们在政治运动中，说了真话被划成“右派”，这是由于偶然事件，给我们造成命运悲剧。身份不同情况不同，从个人命运来说，好像没有太大区别，反正都是政治冤案受害者。两者不同的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遭受的苦难更多。

想想这位彭老总的沉浮人生，再想想作为草芥之民自己的人生，我们过去所经受的那些苦难和屈辱，就没有什么想不通的了。联系到自己的经历，当时毕竟还算年轻，政治身份恢复正常后，总算赶上比较安定的年代，后半生尚能做点自己的事情。不然不会有我后来的写作，更不会有这套书中的文章，这就是说，人不会永远这么倒霉。人生实在不好预测。一个好的偶然机遇，或许把你抬得很高，一个坏的偶然事件，或许把你踩在地下，这就是通常说的命运。不知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那么，命运又是如何造成的呢？早年我未认真地想过，好像从来也不想去想，总觉得那是客观存在。直到老到论天过活的现在，回想走过的七十多年人生路，跟同时期的同龄人相比，这才悟出，自己命运的起伏跌宕，原来都是性格捣的鬼。就是日本人芥川龙之介说的：“命运非偶然，而是必然，它就藏在你的性格中。”

我的命运完全印证了这句话。我的性格比较散淡、固执、直率、抗上、不愿受人摆布，在一个有约束的社会里，必然要受大罪吃大亏经受磨难。按照世人追求的所谓“进步”，应该说，从年轻最早的时期，到中年重新起步时，我都有极好的“进步”机会，闹好了完全有可能谋求一官半职。比如说，在部队时我在兵团级直属机关任职，又比如说，转业以后我在国家中央机关当职员，再比如说，“右派”问题改正后我在国家某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换个想当官性格又温顺的人，这都是求之不得的“进步”境遇。可是，我却觉得根本不适合自己的志趣，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脱离，非要往文人扎堆的文学单位跑，这一干就是大半辈子的时光。

同样是性格的驱使和左右，在文人堆里也没有吃到“好果子”，这不是命运的注定又是什么。有位比我年轻十多岁的作家朋友，后来成为副部级的干部，有次曾坦率地对我说：“你不必溜须拍马去钻营，哪怕你什么话都不说，几十年下来，你都比现在混得要好。”我听后只是淡然一笑，

既表示认同他的看法，又显示我活得也不错，假如他非要我回答的话，我想说：“什么人什么命嘛。”我的命就是老天给了我一支笔，让我在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写下了我想说的一些话，不然就不会有这套书。这就是命运对我的回报。足矣。

我这套书的出版也是命运使然。我的年龄告诉我，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最近的一次身体检查，癌症又将缩短我的生命。我只能坦然面对命运的摆布。好友、文学评论家陈德宏兄，有次像往常一样来电话问候，跟他说起我近日患病的情况，他建议我把自己写的东西，出套文集作个阶段性总结，这样，我才产生出版这套《柳萌自选集》的念头，不然，我绝对想不到做这件事。

我的职业就是个报刊编辑，文学写作不过是业余而为，把这些短小文字汇集出版，无非是给自己一个安慰。自打喜欢上文学那刻起，苦难的种子就植在了我身上，先是以“不安心工作”为由遭整治，次是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审查，最后在“反右派”运动中成贱民，前半生几乎没有安宁过一天，原因都跟爱好文学有一定关系。想到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想到后半生的平静生活，想到文学给我的快乐与烦忧，给自己的命运留下点浅浅印迹，我觉得还算说得过去。这就是在这炎热的暑天，利用跑医院治病的间隙，不顾劳累整理书稿，唯一可以说得通的理由。

在写作营结束前一天晚上，来自克罗地亚的青年作家马瑞科·可塞克先生，在加拿大华人小说家张翎女士陪同下，参观完有故事的605号房舍，由张翎女士做翻译我们一起聊天儿，除了文学也谈到了命运——彭德怀的命运，普通人的命运，都成了我们关注的话题。看来命运对所有人来说，都有普遍的兴趣和意义。这正是人们对于605号别墅房舍，比对别的豪华别墅更想探望的原因。这就启发我以命运为话题，写了这套丛书的自序，目的是想告诉读者，我书中有太多的文字，都是关于普通人命运的，说不定会对诸位有所裨益。

诚挚感谢何建明先生，成全我出版这套书的愿望。

作家出版社的老同事曹全弘先生、初克堡先生、罗静文女士、祁斌女士，责任编辑李亚梓女士，都为这套书的出版付出辛劳，我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2010年7月26日伏天

目 录

早老的青春（半生记忆）

第一部：青春起步两度遭难

二十年后又归来	2
从未摸过枪的军人	4
在西郊部队疗养院	9
小胡同里的忧欢	13
初尝政治苦果	16
一本诗集引的祸	20
美好往事成“罪过”	22
我的同命运朋友	24
欲加之罪总有说辞	26
被毁灭的读书梦想	28
无法挽回的命运	31
开始就闹翻的批判会	33
自己要来的“结论”	35
一次安抚性的谈话	38
总算离开部机关大楼	41
遭遇灭顶之灾	45
等待分配来的是顶“帽子”	49
戴“罪”流放北大荒	51
亲人咫尺相望难相见	55
想起幼年许下的愿	59

第二部：北大荒的流人岁月

重返北大荒	61
另类生活从这里开始	64
王震开始称“同志”	70
转瞬即逝的宽松	74
各式各样的家庭危机	80
光棍儿的苦乐谁人知	84
可敬的“右派”亲属	89
“反右倾”吹走了歌声	92
网开一面的生路	95
在大饥荒的年代	99
形形色色的“罪行”	102
饥饿中的挣扎	105
野地里的小酒馆	108
结局还算圆满	111
“右派”开始脱冠	115
永远的荒原火车站	119
投入父母的怀抱	122
住在家里的日子	126

第三部：再度发配内蒙古草原

分配名单公布以后	129
什锦花园招待所	132
初识草原青城	136
我当了电信工人	141
正是男大当婚时	145
对“右派”问题提出申诉	148
千里之外的姻缘	151
腾格里沙漠的喜讯	156
茫茫银河谁架桥	159

第四部：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生活不再平静	162
--------------	-----

众人造反我逍遥	164
音讯中断的妻子	168
逍遥不再属于我	171
“内入党”的“特殊党员”	175
再次有了逍遥机会	179
风雨兼程走边疆	182
集体软禁在军营	186
陈伯达立的“规矩”	189
“阴谋”斗不过“阳谋”	193
再次以身破“规”	196
说不尽的牢骚话	200

第五部：晦气渐消运有转机

未再戴的“右派”帽子	203
只想能够跟家人团聚	206
未想到重归报人队伍	209
这里的小环境还算不错	212
陪《光明日报》记者采访	215
自报家门“我是右派”	218
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221
小道听来的好消息	225
在奔波中盼望平反	229
调工资引起的风波	233
借调电话打到集宁	236
一次化险为夷的建议	240
两进一出报社文艺部	245
等待留不如争取走	248
进退两难的尴尬	254
时来运转的时候	259
人生的最后归宿	263
无法弥补的遗憾	267

沙滩拾残贝（文坛往事）

记忆，从春天开始	270
简易楼里的中国作家协会	276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发表后	282
出刊即停刊的一本杂志	288
作家出版社淘的第一桶金	292
第五届作代会的一个小插曲	296
见证第一个杂文学会的成立	303
逼出来的《作家参考丛书》	307
关于“三驾马车”上路前后	310
一次尴尬的颁奖会	319
在维也纳当了一次“富翁”	323
时间不当走云南	326
抢来的小说《感谢生活》	330
《小说选刊》是怎样复刊的	333
刊林独苗《长篇小说选刊》破土记	343
命途多舛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351
开春吹来《三月风》	359
我所经历的文学评奖	363
公开谈论“一稿两投”	369
大众“参考”的年代	372
我与几家新时期杂志	377

消逝的背影（文坛故人）

走近诗人艾青	382
想起作家秦兆阳	387
我印象中的孙犁	391
诗书写大漠	394
心地干净寿自高	397
迟到的告别	399

吴祖光和三套书的诞生	402
“泥土”上的“苦难草”	406
书外的“哈哈”老头儿	409
一生坎坷一生诗	411
战士自有战士的情怀	414
长不大的老画家	417
结识于苦难中的画家	419
巴山蜀水育诗情	422
雨天的怀念	425
文人秉性平民心	428
身后不寂寞	431
花开未待春暖时	434

A decorative black flourish consisting of several elegant, swirling lines that curve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ending in a small dot.

早老的青春（半生记忆）

第一部：青春起步两度遭难

二十年后又归来

“右派”流放生活即将结束的1978年秋天，披着内蒙古草原的凛冽风尘，我回到离开了20年的北京，到六铺炕《工人日报》社报到。

我此时的心情，畅快、轻松、充实。绝不亚于第一次来北京。兴奋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前一天夜里火车上不眠的劳顿，完全被兴奋和遐想驱赶殆尽；压抑得近乎板结的心田，重新又长出了希望的绿色。盘旋在脑海里的那些往事，就像蚕丝似的一缕缕地抽出，缠绕在我尚好的记忆之树上。这只吐丝的蚕，就是北京。

北京，这座帝气和民风交融的城市，对我来说并不是十分陌生。早在1949年之前，我就曾跟随父亲来过，第一次领略它的恢弘气势，只是那时它名字还叫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参加革命从天津来北京，开始在这里定居、工作，更进一步熟悉了这座城市。因此，离开20年以后再回来，多少觉得有种归宿感，情绪自然就略显激动。走在一些熟悉的大街小巷，看着灰砖青瓦的宅院，闻着槐花四溢的芬芳，听着委婉圆润的京腔，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顿时悄悄袭上心头，我不禁自言自语起来：“回来啦，真的回来啦。”这时我已经人到中年。

1958年离开北京之前的那些年，我是个人走家搬的小光棍儿，就像一朵来无牵去无挂的云，飘到哪里都照样悠闲自得。即便那时被无情的政治伤害过，是云也是一朵带着残缺和忧伤的云，但是毕竟不会牵涉更多关系亲近的人，不管思想负担如何沉重也还算单纯。无情的时光走过20年的现在，我已经为人夫为人父，身上自然多了几分责任和沉重，思前想后自有一番感慨在心头。

我的“右派”帽子，在1960年说是摘了，其实，既定的政治身份，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在一些熟悉我的“革命者”眼中，我依然是个“摘帽右派”，在罪恶的“文革”运动中，连摘帽子的事实，都不再被承认，一些人干脆直呼“右派分子”，或者叫“老反革命”、“老右派”。每当听到这些呼